

吕振羽评传

刘茂林

叶桂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茂林 叶桂生 著

吕振羽评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吕振羽评传

刘茂林 叶桂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8.625印张 224千字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200

定价: 4.95元

I S B N 7-80050-183-3/D·27

筆路藍縷長留
先驅足跡
丹心鐵骨永葆
戰士青春

為呂振羽評傳付梓書贈

茂林同志
桂生

江明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

——吕振羽

吴 泽

吕振羽同志是我们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融革命和学术于一炉，集革命家与学者于一身。为中华民族的前途，他曾戎马倥偬，转战疆场；为开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他又荷笔学林，从事历史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史学反映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对于研究和总结现代史学发展史有着重大意义。我早年就学于中国大学，师事吕老多年，是他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又指导我从事史学研究。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给了我许多难忘的教诲，时时刻刻激励着我在革命和史学研究道路上努力前进。

(一)

在三、四十年代之际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吕师先后撰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之谜，首创了殷商奴隶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和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同当时和以往非科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学说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草创和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为了探索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究竟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有些学者宣称，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摧毁，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的残余”；还有些人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革命问题，只要努力开矿、办工业、造铁路就行了。他们妄图转移革命目标，甚至取消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场论战引起很多学者各种各样的反思。有些人认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什么共同的或一般的科学规律，更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针对上述观点，郭沫若同志首先奋笔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巨著，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为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战国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为封建社会，论证了社会形态学说序列体系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吕师也挥笔撰著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7月人文出版社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揭示我国史前社会经济结构、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等血缘氏族制度奥秘的科学著作。

对中国史前社会的历史，历来有很多神乎其神的口碑传说。一些封建史家把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说成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黄金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据此而铺演成“大同世界”的理想王国；还有些人利用史前史，“言必称尧舜”，鼓吹复古主义。“五四”以来的一些史家主张中国古史是由古代神话传说逐次地编制而成。虽有其反封建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他们连把古人口碑传说中所蕴含的一定史学也完全否定了，是不全面的。吕师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以及当时仅有的一些地下出土文物作相互印证，对古文献中大量上古神话传说进行了科学的系统的剖析、考察，发现传说中所说的“茹毛饮血”、“未有宫室”，同人类原始社会中早期原始人生活的特点相合；“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同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相合。在母系氏族社会之后，还经历了一个父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从而把多少年来隐秘在人们心中的谜底揭开了。吕师还考证了神话传说所反映出来的区域和有关文物出土区域的大致的一致性，有关神农氏和尧舜禹神话所指明的时代和仰韶期文物所指明的时代的大致的一致性，确认神话传说反映着一定的原始社会历史的史迹、史实。这就使他对整个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有了不可动摇的意义，初步完成了对史前社会研究的探索工作。这确是个重要的开拓，震撼了当时史坛。翦伯赞说得好：“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当时，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古史上有“原始社会”的说法，是“海市蜃楼”的幻觉，妄图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学。吕师的这一揭示，对当时中国革命事业有着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啊！

1934年底，吕师又撰成《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由不二书店出版）。关于殷周社会的性质，郭沫若曾有过精深的研究。吕著的可贵之处在于创立了殷商奴隶制社会论和西周封建说。这对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有着十分重大建树的意义。吕师认为铁器是文明国家产生的条件之一，但中国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地带土质疏松，自古以来是农业温床，没有铁器的青铜时代也可以发展入奴隶制社会。他根据当时地下出土文物史实，认定殷代确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从财产形态、阶级构成、国家形成过程等方面作了全面考察，创立了殷商奴隶制社会说。这一学说，不仅论定了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阶段的理论，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具体事实上肯定了殷代中国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历史学家的认可。郭老于1944年在其发表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也改变了他原来的殷商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观点。殷商社会性质问题的诸家学说，自此日趋一致。

西周封建说，这是吕师奉献给中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古史理

论体系。长期来的旧史学家都认为所谓的“封建”不过是周人“封土授民”、“建社稷”而已。吕师则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大胆地试图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去探索这个所谓“封建”的社会形态属性问题，并在世界古代史的启示下，从各个环节论证了西周初期领主制封建社会的性质，认定西周封建制的形成过程大致到宣王中兴时完成。当时，他提出这个论断时，还比较原则、简朴，解放以后，他不断修改、补充，完善了这一学说。并明确说宣王中兴前西周社会作为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复杂的过渡时期。他指出这个过渡的特点是和武王革命后“新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广大国家内各地区、部落部族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相适应的。

吕师这一学说的提出，引起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重视。1938年，翦伯赞在其所著《历史哲学教程》中，肯定了吕师的见解“给予中国封建制以详细的说明”。1940年，范文澜也撰文主张西周封建制的说法。到四十年代中期，延安和后方一些地区的很多著作都响应西周封建说。随后，特别解放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以及其它各种不同的社会分期说，五彩缤纷，百花齐放。古史分期讨论也随之而全面开展起来，促进了历史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水平和史学工作者队伍的修养和素质。这，确是中国历史科学史上值得人们注视和珍视的一件大事。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吕师的又一部力作。他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全过程整理出了一个合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总规律的体系，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三十年代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之一，也是思想文化战线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在哲学史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们抹杀中国哲学史生动活泼的发展

过程，抹杀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革命性和阶级性，企图以此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意义，取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这是社会史论战在哲学史领域中的延续和发展。有本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著，绪言中声称以什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思想，实际上，整本书所叙述的内容全是按神权、贵族、王权几个时代依次递进的程序叙述思想史。它把商代说成是“神权时代”，西周至春秋说成是“贵族统治时代”，战国至清说成是“王权时代”，对具体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分析，也不作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而是大量罗列思想家的言论，以史料代分析、代论证。这样一份唯心主义十足的著作，居然被有些杂志吹嘘为国内“最详细”的唯物辩证法的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论著，危害非浅。为了堵击这一反动理论，吕师放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转向对思想史的探讨，也撰写了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6月由黎明书局出版。

吕师《思想史》的突出贡献，在于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整理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合乎规律的体系。用吕师自己的话说：“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首先，他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叙述为顺应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而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周代领主制初期封建制发育成熟的时候，产生了建筑于其上层的精神产品——孔子的集大成的政治哲学；在秦汉以来新兴地主阶级经济上取得支配权，并在政治上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统治时候，产生了董仲舒的“大一统”的政治哲学；在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封建经济走向晚期的时候，产生了黄宗羲、王夫之、龚自珍、魏源等代表市民意识的政治哲学。其次，在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部分的起落，相继产生过老聃的复古主义，庄周的厌世主义，葛洪的神仙术等等；由于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变化，产生过杨朱的为我主义，韩非的法家思想等等。此外，由于社会内部敌对矛盾的发展，也产生和统治阶级敌对的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战国，有墨翟、许行的政治哲学；在

汉魏，有王充、鲍敬言的政治哲学；在明代，有王艮、李贽的政治哲学。总之，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第一次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体系所作的带有规律性的阐述，整个思想发展的进程被叙述为有根有源、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过程。

《思想史》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编纂方面的成就。当时，国内外没有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全面反映中国思想史或学术史规律的专著。在这种情况下，吕师选了《剩余价值学说史》为编书的范本，依其精神编著了《思想史》。他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叙述思想史的演变和发展，深入发掘每一位思想家或思想流派的观点及其意义。全面叙述，重点突出。对于各家各派的思想，按其在历史上地位和影响，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和研究，重点和非重点掌握得较有分寸。这是第一部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起来的思想通史著作，实际上在学术思想研究领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体例。这个体例，按章节叙事，既顾及时代的纵向发展，又照顾了阶级的横向联系，还涉及到各阶层、各流派，把思想家思想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阶级实质、社会意义充分揭示出来，这在历史编纂学上也具有开拓性的创新意义。

《思想史》是战斗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开拓性著作。它以对中国思想史发展规律的科学阐述和编纂安排，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特别是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及时地给以有力的打击，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吕师以上三本著作的诞生，丰富了这一新兴的史苑，从一个重要侧面证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师撰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

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著作，批判了法西斯侵略史观，以通史、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丰富了中国历史科学。

吕师对日人秋泽修二法西斯侵略史观的那场批判是令人难忘的。那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践踏蹂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以秋泽修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御用文人为他们主子的侵略行径张目，鼓吹侵略有理论。他先后抛出《东方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本专著，胡说中国社会历史是“循环”、“退化”的，需要“皇军的武力”去“最后的克服”。由于这些书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旗号，所以曾迷惑了一些人。当时，吕师住在重庆北碚，他一谈起秋泽修二的那本书，常常怒不可遏，便日以继夜地奋笔疾书，一连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问题》等文章，驳斥了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侵略史观。这场批判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对激发全国同胞的抗日救国热情，起了重要影响。后来这些文章辑成一集，题名《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由桂林耕耘出版社出版。吕师对现实政治如此敏锐，对国家民族如此热忱，对革命事业如此负责，对我们是很好的身教言教，使我们深知作为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该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战斗、批判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优良的风风。

这一时期，吕师还编写了《简明中国通史》。如吴玉章同志所说：“现在抗战还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很需要我民族优秀的儿女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底历史，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吕师的这一著作，正是这种社会需要和历史的产物。1940年6月，他即写就了《本国史研究提纲》，1941年2月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的编著，同年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通史

著作。不久，范老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在延安问世了。由于皖南事变爆发，吕师没有能及时完成下册的编著，一直到1948年挺进东北以后，才抽暇和江明同志一起完成了下册的撰著。在那个时代里，新型的中国通史的出版，是轰动全民族的大事，当时重庆的书店和出版社，以在书店门口高悬彩色广告，象节日盛礼那样来宣传和欢庆新通史著作的诞生。

吕师在题为《谈史学——致青年同学》的文章中写道，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鉴往知来，正确地把握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社会的客观动向，指导群团、民族、人类努力的方向，提高人类的创造作用”，“历史科学是人类生活的指南针”。《通史》贯穿这样的治史精神。环绕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新形势下所提出的各种新课题，从对历史经验总结和规律的探索上，阐明中国革命应该努力的方向。

首先，《通史》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过程作了全面概述。它把殷以前定为原始社会，殷定为奴隶制社会，西周定为初期封建制社会，秦以后定为专制封建制社会，人们从生动的历史事实中看清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进程，理解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由来和经过，懂得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这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郭沫若在一次集会上所说的，吕振羽、范文澜的著作“把中国历史系统化”了，“指出了许多最现实的地方”，起了使广大工人、农民、士兵“认识中国的历史”的重要作用。《通史》以饱含激情的笔墨，歌颂祖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称赞历代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和英勇豪迈的爱国事业，以深沉激越的笔触告诫人们：“这是祖宗遗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共同来承担，更须一体坚持”。“这种英雄悲壮，为民族赤心忠胆斗争到底的顽强精神，永垂不朽”！《通史》还热情歌颂了历代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叙述了自陈胜、吴广到李自成的每一次重要起义，注意反映农民对

土地的革命要求。还称颂农民起义不屈不挠的斗争，指出：“那没有死灭、并分化出无数的细流也留给后人不少遗产”。众所周知，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历史上劳动人民斗争的光荣事迹和传统，对于正在兴起的人民革命事业，无疑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夫之说过：“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史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强调了历史研究不能把无谓的繁琐的细节提供给读者，而要让人们从历史中知道“得失之枢机”，回答现在和未来的问题。《通史》正是紧扣时代的课题，圆满解答了现实生活要求历史回答的问题，在思想领域中产生强烈的影响，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民族简史》是吕师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时刻奉献给人民的又一部重要史学著作。抗战胜利前夕，一些严重歪曲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著作出版，把中国所有民族都说成是五帝之后、文王支衍，以大量篇幅宣扬大汉族主义，鄙视和污蔑少数民族，破坏民族团结。这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全民族的团结，显然是个严重障碍。吕师对这一类著作进行了严正批判，并说：“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在《中国民族简史》中，吕师重点研究了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的历史，还依次叙述了哈萨克族、苗族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并简明扼要地介绍分析了各民族的起源、风俗、婚姻形态、阶级结构等各方面情况和特点，对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作了更为深入的驳斥，有理、有据、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各民族历史的著作，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对各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起了重要作用，翻开了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

同吕师其它著作相比，《简史》有一个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它

所记述的有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情状，是任何文字记载中所见不到的，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作者的实地调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遍访广州的港汊陋船，调查疍民的生活和历史；在延安，也常利用工作之余，走访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战士；到东北以后，更深入山村小寨，遍访那里的穷苦民族。《简史》的很多资料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吕师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在工作和实地接触几个少数民族的情况后，不只发现了一些书本材料大多不可靠，且改变了我自己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认识。”“我更深的感觉到，从事研究工作的进步史家和民俗学者，应从单凭书本等死材料出发的方向，转入实地调查研究和从具体斗争出发的方向，掌握活的情况，获取活的材料。并从这种基础上去认识、抉择和应用书本材料。”他的经验之谈，对我们是个可贵的启示。

从吕师解放前的这些史著中可以看出，他所撰写的每一部著作，从拟题到撰文，都是紧密联系我国革命事业的实际，按准时代脉搏下笔的，所以他的论著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通，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旺盛的生命力。吕师的这些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文章，特别是在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体系等方面的建树，为当世的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三)

解放以后，吕师担任了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依然抽暇进行历史科学的研究。他在建国以后史学研究的成果很多，然其最突出的贡献，是对民族关系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见解。先后撰写了《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从远古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等民族史研究论文。

他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本质上不存在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社

会依据；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相互影响，形成“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构成今天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凡生活在今天国土以内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该再象旧史学家那样以汉族的历史或中原王朝的历史替代中国的历史；“插花式的交错和人口的杂处”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特点。

吕师对民族关系史所作出的这些论述，是和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全面建设和发展相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根除了千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旧中国的统治和压迫，消除了少数民族内部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使社会主义民族事业的发展有了全新的内容和基础。各民族有了统一的经济机体，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但是，良好的基础还需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去巩固发展，需要不断克服破坏民族团结的形形色色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而在这方面，从历史上阐明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特点和主流，对于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北京中央党校授课期间，吕师充分发挥了他卓越的史学才能。他的中国通史授课博采众长，深入浅出，理论性强。这一时期，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有着很多很好的设想，希望开辟军事史、妇女史、政治史等各种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还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波澜和曲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见解。

1963年，吕师因蒙受不白之冤而身系囹圄。但他仍未中断历史科学的研究，写了二十万字有关史学评价的文章。这些文章或对报上有关史论文章的观点作进一步阐明，或提出商榷意见和反批评，或借题发挥提出自己体系性见解。内容涉及史学史、民族史、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史学理论等各方面的问題，研究了王充、杨泉、王安石、郑观应、包世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陈天华等古代和近代的许多人物。文章立意高、见

解深，多有独创之见。吕师能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坚持评史论史，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其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的威逼利诱下，他不愿作刘少奇的谤书，不愿作影射的评法批儒，坚持了对秦始皇的两点论，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新的史著，经受了严峻、激烈的考验，体现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本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难得的正气篇。

1975年，他出狱后，我去探望这位尊敬的师长时，他的健康情况较前差多了，但他对革命还是那样坚定，对未来还是那样充满信心，他常常同我谈起史学理论如何深化、史学研究如何开创新局面等问题。当时我虽然为他的身体状况焦灼不安，可怎么也没想到，1980年7月17日，他竟匆匆离开了我们。这是我国历史学界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吕师的著述是丰富的，十分深刻地反映了将近半个世纪来我国史学界经历的道路，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吕师是我国史学界有影响的人物，研究他的著作，对于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革命事业的积极作用，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及其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了解整个现代史坛敌、我、友三方史学流派的斗争，总结和研究现代史学史都是很有必要的。

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随着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繁盛，史学也随之而不断发展。吕师的史著中所论述的某些具体的史事论断，包括那些有关重大开拓性、创造性的史学理论和科学论断，难免还有所疏漏和不完善之处。然而，成就和疏失，贡献和不足，都是他从事革命和治史道路上前进的足迹的反映，也正是其史学著作的价值处。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史学水平的提高，许多史学问题，有待我们史学界同志们遵循党的双百方针，继续努力研究、继续探讨。但，开拓者的启示是值得我们后继者永远珍视的。我们在研究郭老和吕师等前辈史学家学术论著时，如果注

意把它置于写作的具体时代中去考察，放到当时所渴求的社会价值上去考察，放到相关的学术发展上去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史著的时代光泽是何等夺目，他们的开拓精神是何等勇猛。他们在史学发展史上所起的里程碑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朽的。

今天，令人高兴的是，开拓者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在蓬勃发展，史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他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他们的革命传统正在发扬光大。我们将更好地继承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优秀史学遗产和光荣革命传统，站在时代主潮的前列，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现实，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璀灿和繁荣作出贡献。

附记：1986年10月吉林大学召开吕振羽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1986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吕振羽》，是我的发言摘要。本文是我就发言摘要基础上补充整理成文的。刘茂林和叶桂生同志近撰《吕振羽评传》已定稿，来函要我写篇序文，我就将这篇补充整理的成稿用作代序，聊述我对吕师缅怀之念。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于上海